

曲阜鲁国故城布局新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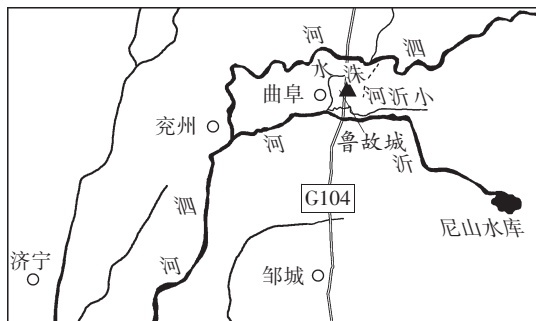
陈 筱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讲 师)
孙 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 授)
刘汝国 (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副研究馆员)

曲阜鲁国故城(下文简称鲁故城)位于山东省曲阜市旧城及其以东和以北地区(图一),是周代和汉代鲁国都城的遗址。由于周公是兴周灭商、辅佐成王和创立周代礼乐制度的元老重臣,周公的封国鲁国^[1]在周代诸侯国中也具有特殊的地位,其等级和形态最接近周王朝都城,为其他诸侯国所效法。可以说,鲁故城遗址是研究上古都城发展史及中国城市规划史的重要范例。基于对鲁故城历史地形的勘察,本文提出了关于鲁故城中轴线走向和布局特

征的新认识,就此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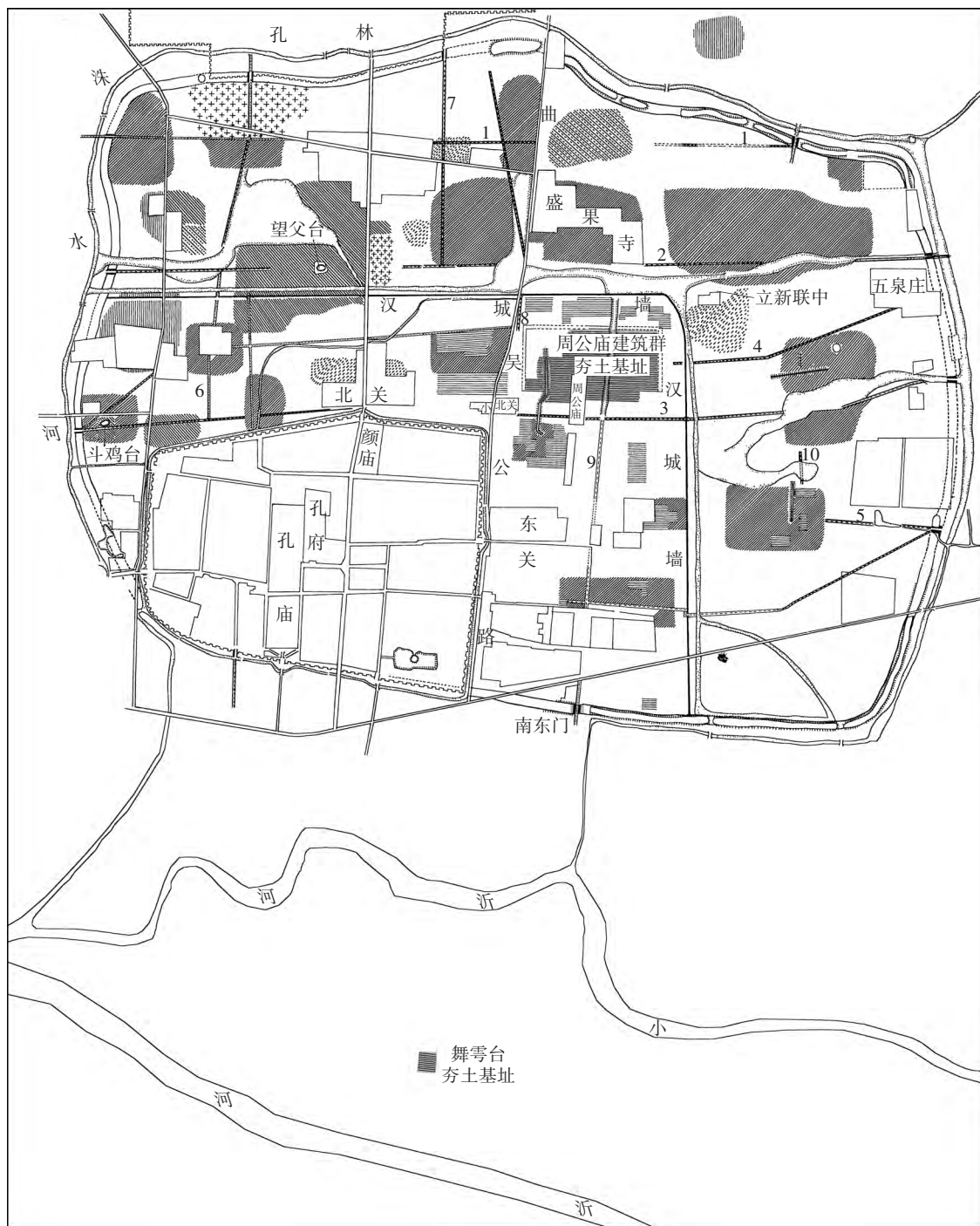
一 已有考古与布局研究

早在 1942~1943 年,日本人关野雄、驹井和爱等就对鲁故城进行过调查发掘^[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故城遗址范围内陆续有周代遗存发现^[3]。为了对鲁故城有更多了解,1977~1978 年,山东省博物馆对鲁故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包括在城墙上 3 个地点开挖探沟 14 条;在城内 7 处文化堆积地点开挖探方和探沟 28 个;发掘已知 6 处墓地中的 4 处,共计发掘两周墓葬 128 座;还在周代鲁故城遗址内发现了汉代鲁城的城墙、城门遗迹^[4]。依据此次考古工作成果编写的《曲阜鲁国故城》(下文简称报告),成为中国第一部都城考古报告,揭示了鲁故城主要遗存的年代范围,周代至汉代鲁故城发展演变的基本进程,以及周代鲁故城的基本形制和布局。此后,由于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对城市遗迹进行全面考古勘察的难度越来越大,鲁故城的考古工作主要在个别区块持续



图一 遗址位置示意图

* 本文系国家青年社科基金项目“周代都邑布局与规划的考古学研究”(批准号:17CKG010)的阶段性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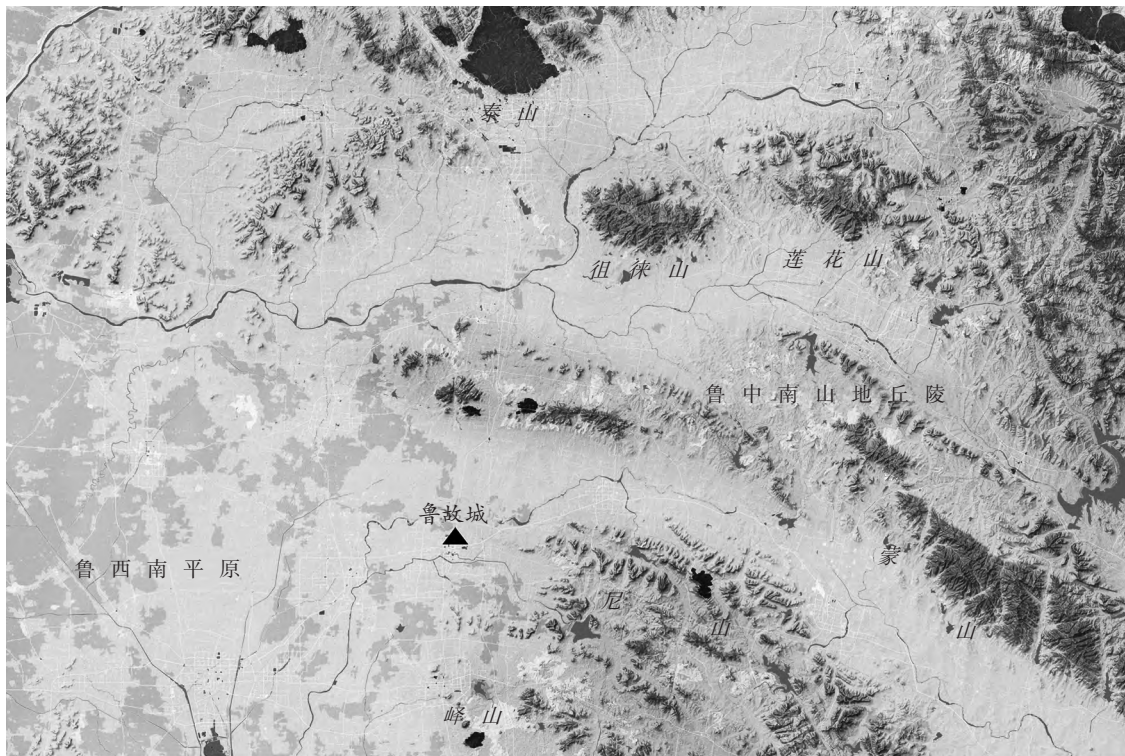


图二 鲁故城考古遗址遗迹分布图(图中序号为周代道路遗迹编号)

推进。2011年以来,对鲁故城的宫殿区、南东门等遗址又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并以此取得了新的认识^[5]。

目前学界对鲁故城布局特征的认识主要

归为两类。一类可称为“中轴”说,即认为周人在鲁故城内外修建了一系列标志性建筑,它们在城市中心构成了一条南北向的轴线,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等功能区都是围绕这条轴线



图三 鲁故城地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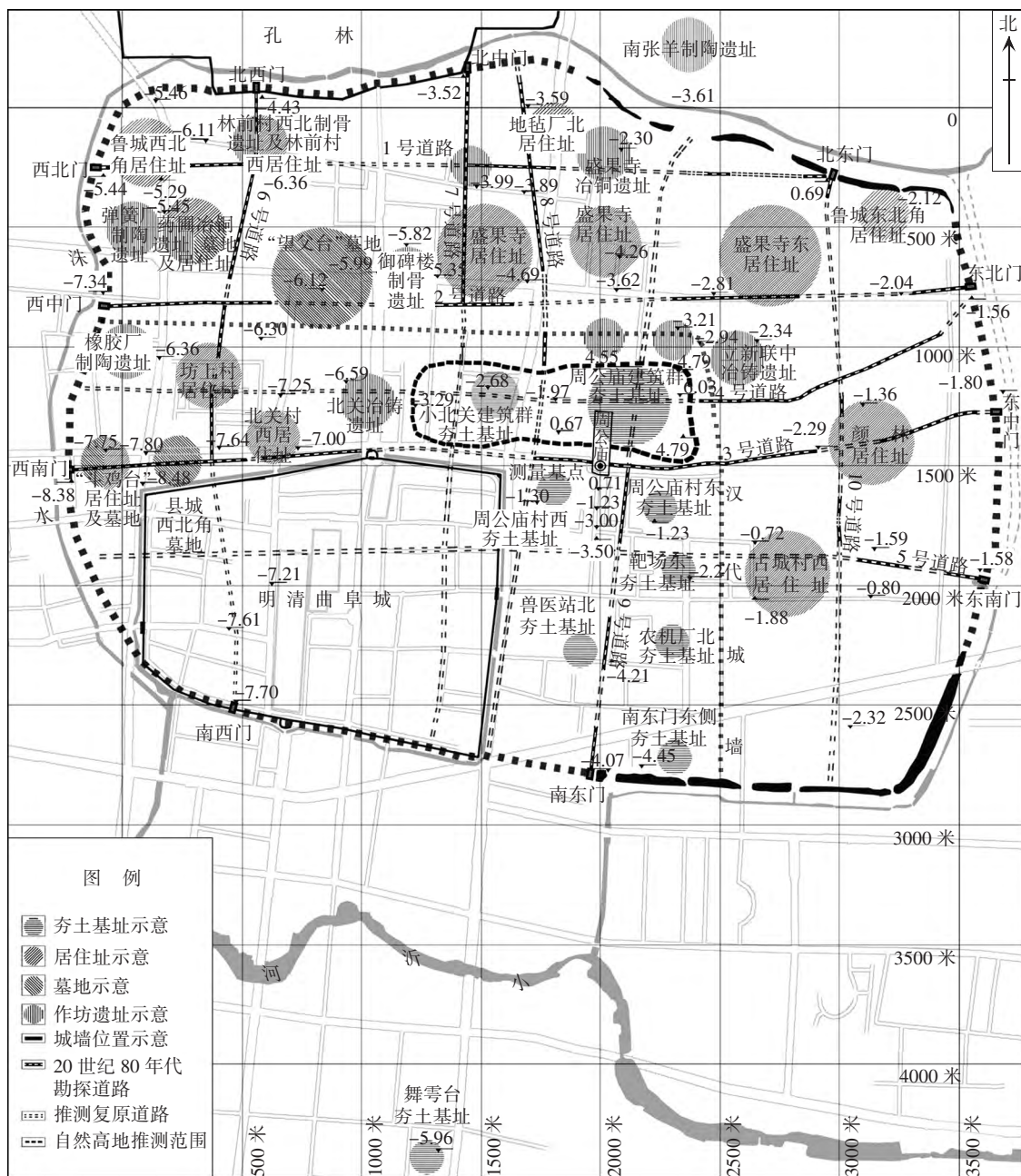
布置的。这一说法最初出自报告结语：“宫殿、城门、‘两观’、祭坛成直线，构成了鲁城的一条中轴线，文献和考古材料都证明，这条中轴线在春秋以前已经存在。”^[6]这一观点影响广泛，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曲阜鲁城遗址”条^[7]、《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8]、《中国考古学·两周卷》^[9]等均援引此说，进而有学者据此评价“曲阜鲁城是我国古代城市建筑采用中轴线布局形式最早的一座故城”^[10]。第二类认识以许宏为代表，他认为鲁城近中部周公庙高地边缘的夯土墙不是宫城城墙，宫殿区的分布范围应远大于此；鲁城西南部汉代城址的始建年代可上溯到战国；鲁城布局并非重垣相套^[11]。如依此观点，“中轴”说恐难成立。

事实上，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值得商榷或完善之处。首先，从实测图上看，宫城（即周公庙建筑群夯土基址）中线、南东门遗址与舞雩台遗址三者并非处于一条南北向的直线上。自南东门开始，三者的连线存在一个明显的转折，三处遗址点实际构成了一个钝角三角形（图二）^[12]。

因而，鲁故城的中轴线走向如何，鲁故城是否参照中轴线布局，仍有待重新考察。其次，第二类认识讨论的主要是战国至汉代鲁故城的面貌，考虑到鲁故城城垣的年代应早于春秋，因此其建成之初的城市布局特征应再作讨论。

二 城市选址与历史地形

鲁故城坐北朝南，地处鲁中南山地丘陵区向鲁西南泗、沂冲洪积平原区的过渡地带。在城址东面，低矮平缓的丘陵从城南、北两侧缓缓向西延展。北面 and 南面丘陵靠近城址一侧，分别有泗河和沂河穿流而过。两支河流在鲁故城以西的地势低洼处连成一片，形成横贯鲁西南的冲洪积平原。其中，北面的泗河发源于蒙山，是鲁西南地区最大的河流；南面的沂河发源于凤凰山北麓，是曲阜地区的主要排洪河道。在鲁故城附近，两支河流的河床宽度达百米以上。选址于此，不仅可以使鲁故城居民拥有充沛的水源，占据肥沃的土壤，高效地从事农业生产，还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河道的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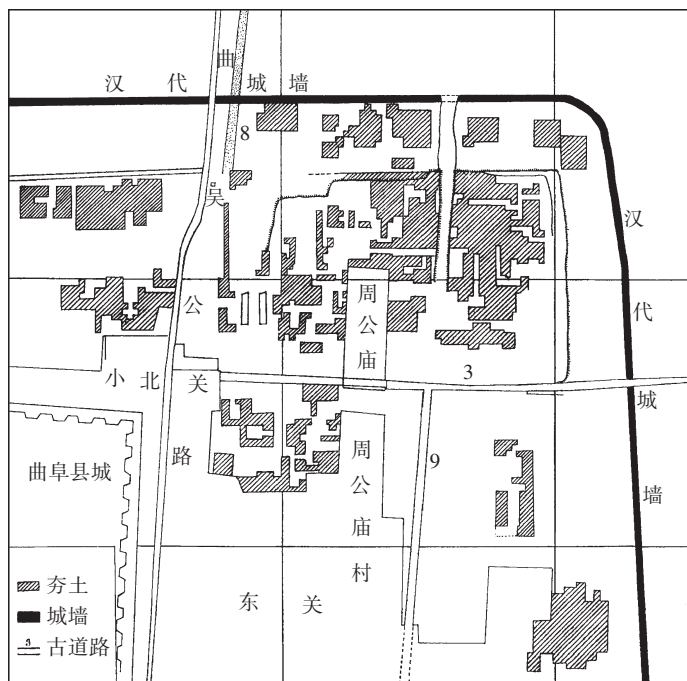


图四 鲁故城自然高地推测范围示意图

动迁移,避免洪涝灾害(图三)。

在鲁故城内,由于存在河套断裂和不透水岩层等特殊地质构造,泉水资源较为丰富,至今城内还保留着逵泉、南泉、小泉、五泉庄等地名。在鲁故城外,源出城东五泉庄的洙水向西流折而向南,形成西、北两面护城河,另一支向

南形成东面护城河;南面有沂河支流小沂河流过,整体构成环城壕沟的主要水源。距城址北约2公里,有泗河干流由东向西、自鲁故城西约10公里处曲折南流,与流经城址南部的沂河交汇。由于鲁故城内、外丰富的水资源,即便已选取趋避水患的有利位置,如遇大洪水,仍有被



图五 周公庙周边建筑群夯土基址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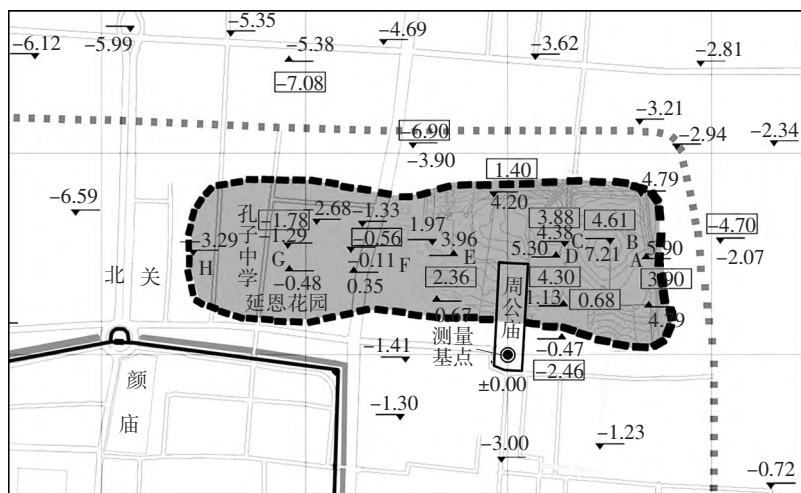
淹之虞。曲阜有史以来,水灾常有发生,危害很大。1840~1990年,曲阜共发生水灾34次,平均4.4年1次,其中发生重大水灾26次,小型局部水灾1~3年即发生1次^[13]。考虑到春秋至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温暖时期,降水量大于近现代,鲁故城的防洪问题应更加严峻。文献记载,在鲁庄公执政的三十多年里(前693~前662年),虽曾“浚洙”一次,仍三次遭遇“大水”;试掘

表明,鲁城北部盛果寺村西遗址T901西周时期的第六层C小层为积水形成的黄褐淤土^[14]。

值得注意的是一块位于鲁故城中央的自然高地(图四)^[15]。报告描述这块自然高地的范围道:“(鲁故城内,笔者注)中、东部高起的地方,其基础是城东防山(即古文献所称的‘曲阜’)向西延伸的余脉。它以周公庙高地为最高点(高程70~78米),向东延伸至古城村,向西经过小北关至曲阜县城北门一带。”^[16]实地勘测可知,位于周公庙附近的这块自然台地,目前由于104国道(原曲吴公路)的切割以及现代房屋的占压,多处遭到破坏,原有规模、边界已较模糊,它的完整范围包括“周公庙高地”,即周公庙建筑群夯土基址所在的高地,以

及104国道西侧的小北关建筑群夯土基址所在高地、延恩花园及再往西的孔子中学,直至明清曲阜城北门外的北关一带。

考古发掘证实自然高地很可能是鲁城的宫殿区,或为文献中的“中城”^[17]所在,其上紧凑分布着大量夯土基址,东部的周公庙建筑群夯土基址,发现了唐宋、两汉和春秋战国共计上、中、下三个时期的地层堆积和两汉、东周两期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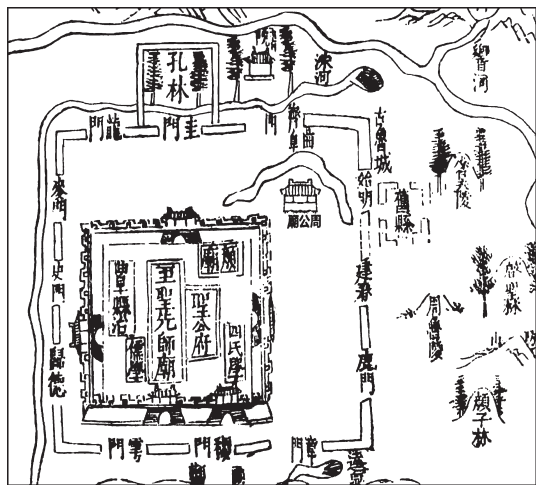
图六 鲁故城自然高地高程勘测图(无方框标高表示地表高程,带方框标高表示生土高程)

遗迹;西部的小北关建筑群夯土基址,文化堆积较薄,仅有两层文化层,共发现两组夯土基址,基址分居南北,相距约 100 米,上面散布的大量战国和汉代的筒、板瓦,云纹圆瓦当和铺地方砖,基址年代尚未断定^[8]。从考古实测图可以看出,小北关建筑群夯土基址的南面一组的东端被 104 国道切断,完整范围可能还向东延伸,与周公庙建筑群夯土基址相距不过数十米(图五)^[9],报告描述道:“这里是周公庙高地向西延伸的部分,地势较高。”^[20]将鲁城围绕这块自然高地修筑,可以在洪水来袭时留下足够面积的庇护所,减小水患的威胁,换言之,自然高地的存在极有可能是促成鲁国国都选址于此的关键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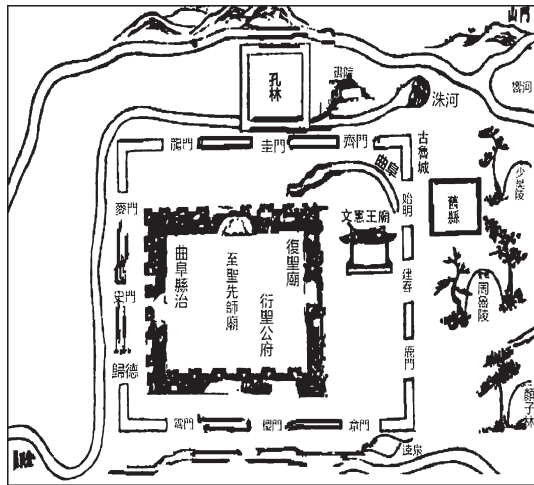
笔者实地考察发现,自然高地整体凸出地表,顶部覆盖着人类活动的堆积物,堆积物以下是较厚的早第三系泥砾岩,高地边缘已遭到近现代城市建设不同程度的破坏。大致推测,自然高地的原始规模东西约 1200、南北约 400、周长约 3200 米。高地顶面东高西低,相对平坦,除了偏东部的地表略有隆起,其余部位的坡面基本维持着同一斜率向西逐渐降低。自然高地的东西向生土线对这一地形特征有着更为清晰的反映:以周公庙庙门台明的西南角点作为高程基准点,则周公庙高台东端(A点)地表高程 5.9、生土高程 3.9 米,周公庙高台中部隆起处最高点(B点)地表高程 7.21、生土高程 4.61 米,周公庙高

台中部的南北向穿沟底部(C点)地表高程 4.38、生土高程 3.88 米,周公庙高台中部的南北向穿沟顶部(D点)地表高程 5.3、生土高程 4.3 米,周公庙高台西部(E点)地表高程 3.96、生土高程 2.36 米,小北关高台东端(F点)地表高程-0.11、生土高程-0.56 米,小北关高台中部(G点)地表高程-1.29、生土高程-1.78 米,小北关高台的西端(H点)被现代房屋占压,仅可测得地坪高程-3.29 米(图六)。此外,自然高地周边的地坪一般低于基准点 0.5~4 米,生土线一般低于基准点 2.5~7 米。整体来看,自然高地最高点与最低点的高差超过 5 米,东、北两面较陡峭,凸出地表至少有 8 米,南、西两面较平缓,凸出地表也应不小于 2 米。

东汉文献记载,鲁故城因附近有“委曲长七八里”之“阜”,故又名曲阜,报告认为这里的“曲阜”指城东土山^[21]。有学者经过考辨指出,报告的这种说法最早出现于万历《兖州府志》,实际属于明朝嘉靖初年曲阜县城迁回鲁故城之后产生的误读,而出现最早的“曲阜”位于“鲁城中”的说法,流传有序,应最接近史实情况^[22]。现所见古地图中,符合“曲阜”位于“鲁城中”说法的主要有明末《阙里志》所载“鲁国图”(图七)和康熙年间《阙里广志》所载“鲁国图”(图八),图中“曲阜”位于古鲁城的东北角,平面呈弯曲状,中央向北凸出。若将这两幅图与实测图进行比较,可



图七 《阙里志》“鲁国图”(局部)



图八 《阙里广志》“鲁国图”(局部)

以看出,其在比例上有所失真,图上明清曲阜城的边长大约是周代鲁城同侧边长的三分之二强,但实际上,明清曲阜城的面积不超过周代鲁城的四分之一。同样,周公庙的位置与规模也不符实。尽管如此,这两幅图却都比较准确地标示了地物的相对空间关系:“曲阜”从周公庙东端蜿蜒向西,越过了明清曲阜城东城墙向北的延长线,西端接近明清曲阜城的北关一带,这一范围与自然高地的原始规模基本吻合。如以先秦1尺合0.231米、1里合415.8米换算,自然高地的周长约3200米合7.7里。考虑到自然高地的边缘已遭不同程度破坏,如将“长”作“周长”理解^[23],其实测规模与东汉记载的“委曲长七八里”也算基本吻合^[24]。

《括地志》记载,季子台、大庭氏库及唐代曲阜县治石城都在“曲阜”之上^[25],《元和郡县志》承袭了这一说法^[26]。在小北关发现的南北两块夯土基址,以及在周公庙夯土基址发现的城墙、壕沟,与文献记载的这些建筑或城址是否有关,还待进一步考古探索。总之,如果“曲阜”位于“鲁城中”的说法无误,那么,自然高地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曲阜”所在。

三 城市布局与中轴线

以往对鲁故城布局的研究对“周公庙高地”给予了充分关注,本文则认为自然高地对周代鲁城营建之初规划的城垣、干道、中轴线等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城垣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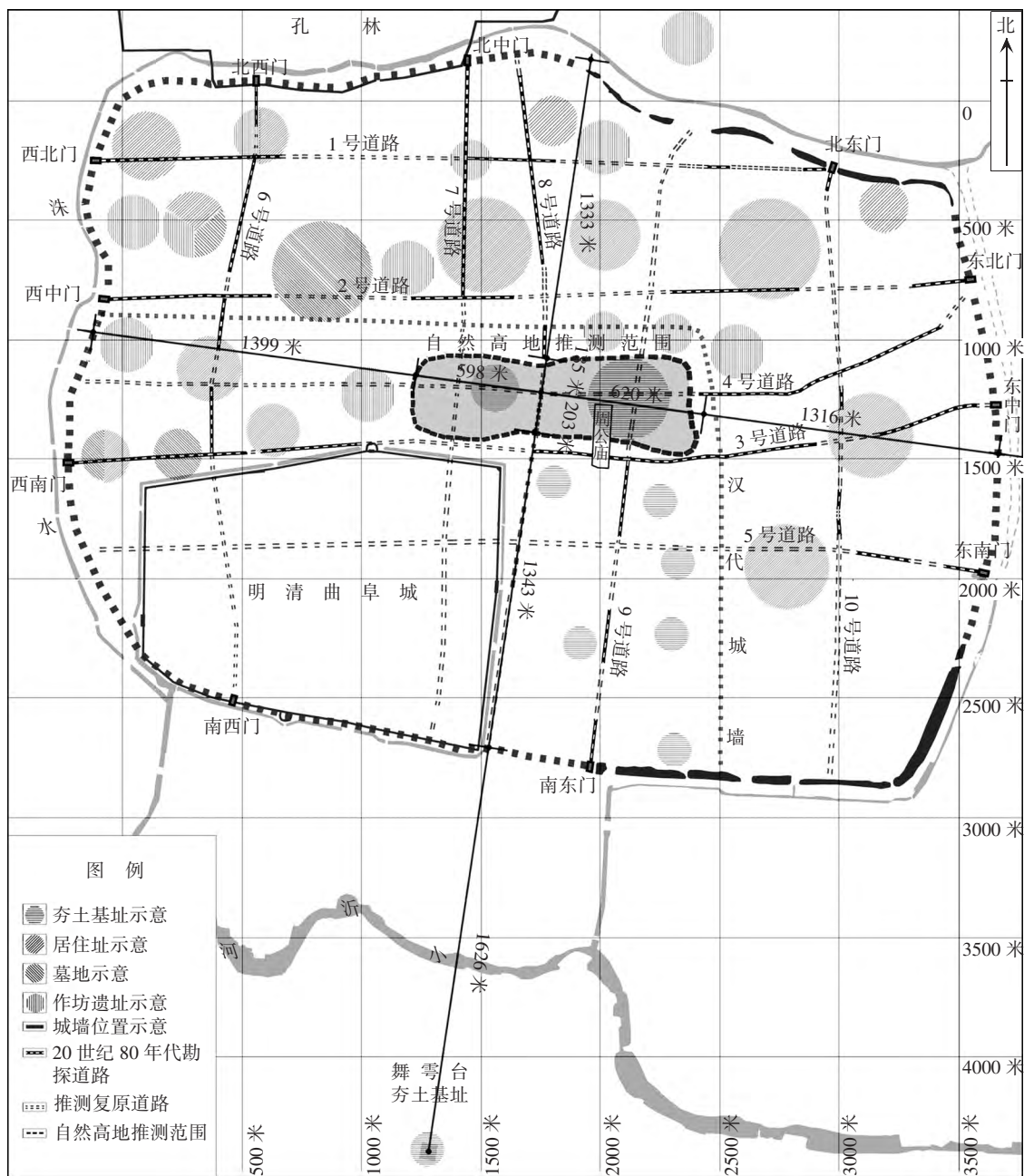
依据报告,鲁故城平面近扁方形,四周城垣只有南面较直,其余三面都呈弧形,城墙周长11771米,其中东墙2531、南墙3250、西墙2430、北墙3560米;城址东西最宽3.7、南北最长2.7千米,面积约10平方千米。笔者实测可知,自然高地北边界距鲁故城北城垣约1333米,东边界距东城垣约1316米,南边界距南城垣约1343米,西端已被现代建筑占压破坏,若作复原推测,其西边界距西城垣接近1400米(图九)。考虑到上古时期大型城址的施工误差,可以认为,上述东西约1200、南北约400米

的自然高地恰好位于周代鲁城的中心,高地四边与相邻的鲁故城城墙距离基本相等,在1300~1400米之间。换句话说,鲁故城的中心就是以自然高地为中心,以自然高地的四面边界为参考规划而成的。

(二)干道路网布局

1977~1978年,在鲁故城内发现了若干道路遗迹,显示出周代鲁城内至少有10条交通干道,其中东西向干道(1~5号)、南北向干道(6~10号)各5条,它们多贯通全城,将城门与城门或城门与大型建筑联系起来^[27]。考虑到交通道路的连续性,在已经探明的干道遗迹的延展线上有可能发现新的同时期路土遗迹,可将位于同一干道上的数段遗迹连成一线并向城墙延伸,从而复原鲁故城的干道网络。可以注意到,鲁城干道网的布局也与自然高地的形态关系密切。

具体来说,8号干道遗迹位于鲁城北中部的盛果寺村西,1978年共发现南、北两段,如将两段遗迹首尾相接,并将南段遗迹的南端延长,8号干道将紧贴周公庙建筑群夯筑基址的西侧向南伸展。7号干道遗迹位于鲁城北中部的林前村东,仅发现一段,如将它向南延伸,正好穿过自然高地的西部。以上7、8、9三条南北向道路恰好将自然高地分作四块,8号干道大致位于自然高地的南北向中线上,7、9号干道的复原延伸线距8号干道的水平距离分别为385、374米,即7、9号两条干道在8号干道两侧大致呈对称分布。在东西方向上,若将西起周公庙高地东侧,向东不远折向东北门的4号干道往西延伸复原,恰好位于自然高地的东西向中线上。在4号道路的北边和南边,分别有2、3号两条东西向干道,它们与4号道路基本平行,通过自然高地的南北边缘。以上6条道路,与自然高地呈对称之势,构成了连接鲁故城宫廷区与非宫廷区的棋盘形路网。余下还有1、5、6、10号4条干道,将它们的道路遗迹延长,构成以自然高地为中心,与自然高地的边缘基本等距的“井”字形网络,它们是鲁城非宫廷区的主要道路。如上述复



图九 周鲁城自然高地与城垣、干道空间关系示意

原干道网络的方法无误，同样可以验证自然高地对周代鲁城干道布局的突出意义。

(三)中轴线走向

在自然高地之外，鲁故城还发现了近十处夯土基址，主要分布在自然高地的南面。由于明清曲阜城和现代房屋的叠压，全面揭露夯土

基址的分布和形制恐怕非常困难。舞雩台是现今所知唯一位于鲁城之外，也是保存质量较好、遗迹年代相对清晰的一处夯土基址。它的位置也与自然高地有着密切的关系。

舞雩台遗址坐落于沂河北岸，北距鲁故城南城墙约 1626 米，其被认为是鲁国的郊祭场所。报

告记载,舞雩台基残高7米,有上、中、下三层,夯筑遗迹分别为春秋、战国和西汉三个时期,土台四周散布着不少战国至汉的瓦片^[28]。既往研究多认为周公庙高地、南东门与舞雩台三处遗址点在一条直线上,这条直线则是曲阜鲁城的中轴线。但事实上,若恢复自然高地的原始规模,复原周代鲁城的干道网,那么自然高地中心与舞雩台的连线恰好通过8号干道及其南向延长线,位于周代鲁城的中央,这才是准确的曲阜鲁故城的中轴线。

此外,周代鲁城其他功能区的分布也很可能与自然高地及中轴线有一定程度的协调关系。据报告,鲁故城内的铁器冶铸手工业地点主要有北关铁器冶铸遗址和立新联中铁器冶铸遗址两处,它们的延续时间都是战国至汉代。从实地勘探的情况来看,自然高地北侧冶铸遗址的堆积较厚,分布相当广泛,如能将它们与北关铁器冶铸遗址和立新联中铁器冶铸遗址视作一个整体功能区,那么鲁城内的大型冶铸遗址也是环绕着自然高地北部且以中轴线呈对称分布。鲁故城内还发现了11处比较重要的居住址,主要分布在自然高地的东、西、北三面;4处墓地,全部分布在鲁城中轴线以西;11处制陶、制骨、金属冶铸等手工业作坊遗址,除1处位于鲁城东北郊,其余都位于自然高

地的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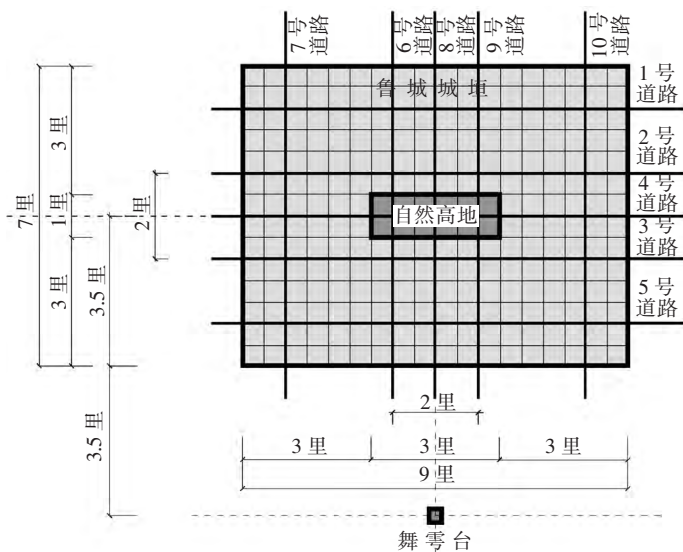
四 布局渊源与变迁

综上所述,周代鲁城的布局很可能是以接近长方形的自然高地为中心展开,城垣从自然高地向东、西、南、北四面大致等距扩展确定;干道路网以自然高地基本呈中心对称分布;连接自然高地中心与舞雩台的直线是周代鲁城的中轴线所在,与8号干道的走向基本吻合;高等级夯土建筑、工业区、居住区和墓葬区等重要功能区的分布也都与自然高地及城市中轴线形成了一定的协调关系。

关于周代鲁故城的规模等级,按前述的先秦尺度换算,自然高地的规模东西合2.9约3里、南北合0.9约1里,周长合7.7约8里,自然高地边缘距相邻的周代鲁城城墙合3.2~3.4约3里,城东西合8.9约9里、南北合6.5约7里^[29],周鲁城的北城墙、南城墙分别距舞雩台合10.4约10.5里、3.9约3.5里^[30]。依据这些数据,可以进一步推测周代鲁城的规划方案(图一〇)。值得注意的是,《考工记·匠人营国》记载了周王城有“方9里”之制。作为次于王城一级的鲁国都城,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即鲁城的東西向长度依照王城制度,按照9里修建^[31],而南北向长度则在王制上减一等,按照7里修建,换句话说,周鲁

城的布局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曾对周代城市规划产生广泛影响的城市礼制,有待未来加以验证。

关于鲁故城的城垣年代尚存一定争论。报告认为,鲁城内时代最早的第一期遗存应属西周初期,南东门东侧第三期城垣下叠压着的第一、二期城垣可能属西周前期,经过试掘可确切断代的最早城垣则分属遗址第三期(西周晚期)^[32]和第四期(春秋前期)^[33]。但多数学者认为这一推定偏早。如许宏认为遗址第一期为西周中期偏早,上述第一、二期城垣,没有可资断代的层位关系和遗物发现,年代尚不能判断,而遗址第三期应在两周之交或略



图一〇 周鲁城规划方案推测

晚,因此可确定为遗址第三期的城垣,也即已知最早的城垣为此时修筑^[34]。以上两种说法,虽在城垣修筑的时间上存在分歧,却都认为在定都之后的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鲁城很可能并未修筑城垣。依据最新的考古成果,周代鲁城城垣始建于西周晚期,延续至战国晚期^[35]。考虑到自然高地与鲁城城垣的协调关系,本文认为鲁城开始以自然高地为中心、舞雩台一线为中轴线,在布局上采取严谨的秩序,其起始时间应与城垣的始筑时间基本一致,即西周晚期。

除周代鲁城城垣外,周公庙高地边缘还有宽约 2.5 米的夯土墙,报告认为系宫城围墙^[36]。根据最新的考古工作判断,宫城偏居高地东部,始建于春秋晚期,战国晚期废弃,汉代重修,最终废弃于魏晋^[37]。可知,周代鲁城以中轴对称的严谨布局似从春秋晚期宫城修筑之时就被打破。

至汉代鲁城,城市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利用周代鲁城的部分西、南城垣,又增筑了东、北两面城垣所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许宏曾推测汉代鲁城的始建年代可上溯至战国,战国时期的鲁城应已有割取大城之一部的小城存在^[38]。若依照这一观点,鲁城布局的改变也可能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随着鲁国国力减弱,为了形成更加有利于保护统治阶级的城郭并列式布局,鲁城制定了统一的规划,在东移并封闭宫殿区的同时还缩小了外城的规模。以上关于鲁城布局的延续及演变情况的设想,是否接近史实,也有待进一步的考古研究。

五 结 语

本文基于对《曲阜鲁国故城》的整理和实地勘察,重新探讨了鲁国故城的选址与布局特征,尤其是城中自然高地的原始规模与核心地位以及周代鲁城中轴线的具体位置。有学者指出,从上古至秦汉时期,中国城市文献的主体内容是城市建设技术方法,具体如选择城市的位置以及设置城市的结构^[39]。鲁故城在这两个方面都显示出较为成熟的水平。鲁故城的位置选定,既便于获取充足的水资源,顺畅地排除城市污、废水,又有利于修建在自然高地上的

宫殿区趋避水患,反映了规划者对鲁故城所在区域的气候、水文和地形环境的充分了解。鲁故城将自然高地作为城市中心,考古工作确认其上有规模可观的封闭城圈以及多组高等级建筑基址,应是宫庙区所在,反映出中国古代都城营建的“择中”原则^[40];将自然高地与人工高台的连线作为城市中轴线,从而形成了较为严谨的城市结构,显示出较高程度的城市规划。轴线清晰、布局巧妙的曲阜鲁国故城可谓中国城市规划史上的经典之作。

附记:本研究得到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鲁故城研究基地相关领导、专家的支持与帮助,尤得刘延常研究馆员、项春生研究馆员启迪甚多,在此一并致谢。

- [1] 《史记·鲁周公世家》:“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参见《史记》,第 1825~1864 页,中华书局,2013 年。
- [2] [日]驹井和爱《曲阜鲁城の遗迹》,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1951 年。
- [3] 1953 年于孔府花园发现一座西周墓,1968 年于北关村出土一批西周晚期铜器,1973 年在小北关发现春秋铜器。参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第 2 页,齐鲁书社,1982 年。
- [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第 89 页,齐鲁书社,1982 年。
- [5] 韩辉等《曲阜鲁国故城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确认了鲁故城宫城解决了宫城、外郭城的年代问题》,《中国文物报》2017 年 3 月 10 日。
- [6] 同[4],第 213 页。
- [7]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等《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 403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 [8]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宫城、大城正南门及舞雩台三者布置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这就是宫城的中轴线,也是曲阜城的规划主轴线。图中 9 号南北干道,便是沿着此轴线建制的全城道路网的主干道。”参见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第 203 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年。
- [9] 《中国考古学·两周卷》:“舞雩台、宫城、南垣东门位于一条南北向直线上,似为都城的一条中轴

- 线。”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第2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 [10] 张学海《浅谈曲阜鲁城的年代和基本格局》，《文物》1982年第12期。
- [11]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第182~18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许宏《曲阜鲁国故城之再研究》，《三代考古（一）》，科学出版社，2004年。杨宽也提出过有一定相似性的观点，他认为：“从曲阜故城的城门的设置和交通大道的布局来看，重心在于西部和中北部，原来整个城的结构是坐西朝东的。”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第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 [12] 同[4]，第4页。
- [13] 曲阜县地方志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曲阜县志资料·自然地理志》，第73~80页，济宁市新闻出版局，1986年；山东省曲阜市史志编纂委员会《曲阜市志》，第83~84页，齐鲁书社，1993年。
- [14] 据《春秋左传》记载，鲁庄公七年（前687年）秋、二十四年（前670年）以及二十五年（前669年）秋，鲁城均遭“大水”；鲁庄公九年（前685年）冬，鲁城浚洙。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71、228、232、178~179页，中华书局，2009年。笔者认为，这次对洙水的疏通，很可能因为前两年洪水导致河道淤积；以后十余年鲁城未遭水患，或也与此疏浚工事有关。另外，鲁城北部盛果寺村西遗址发掘土层参见[4]，第42~43页。
- [15] 图中标高为2012年笔者实地勘测所得。
- [16] 同[4]，第10~11页。
- [17] 据《春秋左传》记载，鲁成公九年（前582年）“城中城”；鲁定公六年（前504年）冬“城中城”。杨伯峻将上述两次“城中城”都视作对鲁国修建内城的记载。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842、1555页，中华书局，2009年。
- [18] 同[4]，第14页。
- [19] 同[4]，第12页。
- [20] 同[4]，第14页。
- [21] 《曲阜鲁国故城》：“东汉人应劭说：‘鲁城中有阜，透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按鲁城中当是鲁城东。阜即土山。今鲁城东面不远有土山，如‘原’高出地面，当即应氏所说的‘曲阜’。城以山为名，似乎是可信的。”同[4]，第1页。
- [22] 陈东《鲁城“曲阜”说考辨》，《孔子研究》2017年第5期。
- [23] 现发现的鲁城城垣东西约合东汉9里，如将“长七八里”理解为“曲阜”的长度，城内显然没有一座规模约占鲁城东西向长度4/5的土丘。故而推测，“长七八里”可能是对“曲阜”周长的描述。
- [24] 东汉应劭最早明确指出“曲阜”的位置和规模，《风俗通义·山泽》：“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属于山陵也。今曲阜在鲁城中，委曲长七八里……”西晋臣瓚注《汉书·地理志》：“鲁城内有曲阜，透迤长八九里。”这两种说法略有不同，但臣瓚应是沿袭自应劭，后世学者也更多引用应劭的说法。参见（东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第472页，中华书局，1981年；（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842页，中华书局，1989年。
- [25] 《括地志》载：“曲阜县治在鲁城中。皇甫谧《帝王纪》云：黄帝自曲阜徙（徙）穷桑，是也。应劭曰：曲阜在鲁城中，委曲长七八里。案：今季子台及大庭氏库及今县治石城，并在其上。”参见陈东《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括地志〉残卷校释》，《齐鲁学刊》2017年第1期。
- [26] 《元和郡县志》：“曲阜，在县理鲁城中，委曲长七八里。今按：季子台及大庭氏库及县理城，并在其上。”参见（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第269页，中华书局，1983年。
- [27] 关于鲁故城道路的数据参见[4]，第25~27页。
- [28] 同[4]，第15~16页。
- [29] 根据报告记载的周代鲁城东西最宽处约3.7、南北最长处约2.7公里计算。同[4]，第4页。
- [30] 根据考古数据，周代鲁城的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很可能是因为在修筑过程中考虑防御、防洪等需求，根据地形调整了原初的规划方案。因此本文依据周代鲁城遗址实际折合里数进行了取整。关于周代鲁城规划方案的初步设想的合理性，有待在未来的考古工作中进一步探讨。
- [31] 另一种考虑是，周代鲁城的边界形态规划是依照周代前期的都城制度，如西周早期燕国都城董家林城址、周原岐邑凤雏周城和洛邑韩旗周城，也都采用的是横长方形城圈。此观点受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的启发。
- [32] 见于西北城角 T205~207 第一期城垣、东北城角西侧 T505 第一期城垣。同[4]，第30~36页。
- [33] 见于南东门东侧 T602~604 第三期城垣。同[4]，第28~30页。
- [34] 许宏《曲阜鲁国故城之再研究》，《三代考古（一）》，科学出版社，2004年。
- [35] 同[5]。

（下转第96页）

- 第3期。
- [7] Mazzeo R, et al.《中国明代木质古建西安鼓楼彩绘的分析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5年第17期;吴晨等《气相色谱—质谱分析在文物有机物鉴定中的应用》,《分析化学》2013年第11期。
- [8] Shuya Wei, et al. Analyt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lacquer objects excavated from a Chu tomb in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1, 38, pp.2667-2674. Shuya Wei, et al.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paint and adhesive materials used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polychromy terracotta army, Qingzhou,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2, 39 (5), pp.1628-1633.
- [9] 杨璐等《中国古代彩绘类文物常用胶料的红外光谱特性研究》,《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六次学术年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
- [10] 任静等《淀粉的红外光谱及其二维相关红外光谱的分析鉴定》,《中国农学通报》2015年第17期。
- [11] 魏书亚等《陕西唐墓壁画和内蒙古大召寺明代壁画胶接材料的Py-GC-MS与GC-MS研究》,《文物科技研究》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
- [12] Shuya Wei, et al. Analyt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lacquer objects excavated from a Chu tomb in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1, 38, pp.2667-2674.

(责任编辑:吴然)

(上接第58页)

- [36] 同[4],第54-55页。
- [37] 同[5]。
- [38] 同[34]。
- [39] 辛德勇《由国朝到宫室再到里坊——论〈两京新记〉在中国古代城市文献编述史上的意义》,《困学书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 [40] 《吕氏春秋》:“古之王者,于天下之中而立国,于国之中而立宫,于宫之中而立庙。”参见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第460页,中华书局,2009年。

(责任编辑:耿昀)

The Layout of the Ancient City of the Lu State in Qufu: A New Investigation

Chen Xiao et al.

The ancient city of the Lu State referred to the capital city of the Lu in both the Zhou and Han dynasties. In the previous study, the axle of the capital city of the Lu in the Zhou Dynasty was supposed to be in a line with the palace (the rammed earth foundation of the Duke Zhou Temple), the Southeast Gate, and the Wuyutai altar. However, this axle line remains inconclusive due to an obvious curve.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eport of the previous excavation, Ancient City of the Lu State in Qufu, and focused on a new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ural high platform that was argued to be the actual remains of the palace in the centre of the city. Its scale matches the records in ancient documents about the length of the Qufu City, 7 to 8 li. The location of the natural high platform was close to the water but avoided flooding due to its elevation. It was the same distance to city walls in all four directions, with the road networks symmetrically emitting from the centre. This paper redefined the axle of the ancient Lu city as the link of the natural high platform and the artificial platform, the Wuyutai altar.

湖南宁乡冲天湾宋元遗址发掘简报

冲天湾遗址地处湘江支流靳江河上游的山丘前沿地带，属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大屯营镇韶光村冲天湾组。2015年3~7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宁乡市文物局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900平方米，揭露灰坑34个、灰沟4条、灶1座，出土大量宋元时期瓷器、建筑构件及其他生产生活用具。其中，瓷器标本总数达2000余件，釉色品类包括青釉、青白釉、酱釉、绿釉等。根据地层关系及出土器物判断，冲天湾遗址的主体年代为南宋晚期至元代早期，为一处宋元时期销售瓷器的草市遗址。本次发掘为了解这一时期湖南地区的瓷器销售、商品贸易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江苏苏州尹山北宋墓（M15）发掘简报

2013年，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在苏州市吴中区郭巷街道尹山社区发掘了一座宋墓（编号M15）。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坑上部已遭破坏，葬具与尸骨无存。墓葬出土有青釉四系罐、白瓷碗、陶钵、漆碟各1件及铜钱3枚。根据出土器物及铜钱、漆碟纪年铭文判断，墓葬年代为北宋中晚期。漆碟铭文记录了其制作地点、生产时间、作坊名号及花押，为了解宋代江南漆器的制作水平、流通情况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曲阜鲁国故城布局新探

曲阜鲁国故城遗址包括周代和汉代鲁国都城遗址。学界以往认为周代鲁故城的中轴线是宫城（周公庙建筑群夯土基址）、南东门、舞雩台三点连线，但实际该连线存在明显拐折。本文在梳理《曲阜鲁国故城》考古报告的基础上，重新调查了位于鲁故城中央的自然高地的规模，认为该高地才是鲁故城完整的宫殿区，且与文献所记长七八里的“曲阜”吻合，选址于此有临近水源、趋避水患的目的。进而通过自然高地与四周城垣等距，城内道路网以自然高地为中心呈对称分布等因素，重新确定了鲁故城中轴线为自然高地与人工高台（舞雩台）的连线。